

闫霞 解读千年石刻碑痕

文 王小柔



闫霞寻访石刻

闫霞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副研究员,参与策划并出镜拍摄纪录片《地理·中国》“中国古建筑史话(一)神奇的古塔”等,出版《北京城好石碑》《真觉寺金剛宝座塔五绝》等。

闫霞把一枚已经风干的文光果放在我手里。我轻轻摇了摇它,木质风铃般的沉闷声在掌心有了一丝欢快。数十株文光果树旁是一方《康熙御制文光果诗刻石》,上面的年份正值“九子夺嫡”储位之争暗流涌动的岁月。我沉浸在古今交错的思绪中,抬眼却望见闫霞举着相机,对准了那尊石狮子。这些年,她不知从多少个角度、在多少种光线下为它留过影——晨光里的棱角分明,暮色中的轮廓柔和,则光下凸显的鬃毛纹路,逆光时勾勒的剪影线条……每一次按下快门,都是与石头的默默对话,在定格的光影里,藏着她与这些碑刻相守十余年的温度。作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副研究员,她的生命早已与这些沉默的石碑缠绕共生,沉浸于石上光阴,她在破解千年碑语,她在冰冷的石头里感受到了历史的温度。

幼年在书中结石缘 从花石纲到五塔寺

闫霞与石刻的缘分,像一块被时光反复摩挲的老碑,初看是不经意间的触碰,细品才觉得每道纹路里都藏着宿命般的牵绊。小时候读《水浒传》,杨志押送“花石纲”的情节让她犯嘀咕:“不过是为了运送几块奇石,怎么就成了绊倒英雄的坎儿?”这粒好奇的种子,在开封龙亭公园发了芽。那时她总趁大人不注意,蹲在那些被游人摸得光滑的石头旁仔细打量——有的石头表面坑洼遍布,形状古怪;而禹王台公园的老石头更显粗糙,棱角略手,却让她莫名觉得亲近,像是在跟一个沉默的巨人握手。

多年前,初来北京时,她拿着一张地图把公园逛成了“寻碑记”。“就像突然闯进了一座石头做的北京城。”她笑着谈起当年的痴迷,那时的她还不知道,这些散落的碑刻终将成为她毕生的牵挂。

2010年,闫霞到位于真觉寺内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工作,站在明代皇家寺庙真觉寺金剛宝座塔下,看着塔身上藏文、梵文与汉文捐资题记交织的纹路,她突然懂了什么叫“到家”。这座北京现存最古老、最精美的金剛宝座塔,塔身上数以千计的佛像雕刻,是明代石刻艺术的巅峰,也成了她研究工作的起点。

最初在馆财务室工作的那几年,闫霞总趁午休去展厅跑——石刻馆向来有传帮带的传统,午休时大家聚在展厅练拓片,她跟着老专家一点点学。墨汁调和的浓淡、拓包按压的力度、纸张铺展的角度,直到字口清晰、墨色匀净才算基本过关。耳濡目染中,她慢慢迷上了拓片背后的碑文,抄录、琢磨,试着讲述那藏在石头背后的故事。展厅中的午后时光,悄悄为她推开了一扇通往石刻世界的门。2015年,随着新展览启幕,她也从财务岗位转到社教部,专职从事石刻艺术的讲解与研究工作。

在北京石景山模式口,有一处承载深厚历史文化的“田义墓”。这里曾是京西古道重要节点,商贸云集,货物贩运络绎不绝,而田义墓便是这条古道上留下的一个亮点。这里的地宫,是北京少有对外开放的地宫之一,与定陵、裕陵地宫齐名。那些年,闫霞曾无数次来到田义墓。夏日中午,她来拍摄碑上的纹饰、翁仲

腰间的“胡人驯狮图像”以及太监墓墓帷上的精美雕刻。她在地宫里啃块面包、喝口酸奶,享受片刻清凉。偶尔有游人到来,彼此都会吓一跳。

从田义墓到翠微山 碑语里的人间烟火

在闫霞看来,田义墓不仅是一处历史遗迹,更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文化空间。田义墓的地宫总在盛夏迎来最安静的时刻。这座北京现存最完整的明代宦官墓园,藏着太多被忽略的细节。闫霞抱着相机蹲在券顶下,镜头对准一幅“孙康映雪”。明代工匠的刻刀太神奇,竟把坚硬的石头雕出了清冽的雪花。汗水顺着额角滴在相机上,她却浑然不觉——为了捕捉最佳光线,这样的蹲守已是家常便饭。

在《勒保夫妇造封碑》碑身左下角,一只灵猴扛着挂满寿桃的桃枝,憨态可掬;右下角的蜥蜴口吐仙气,线条流畅得仿佛下一秒就要游走。《勒保赐谥碑》的角落里,一只石猴抱首蹲坐,神情戚戚,似有悲思;右侧三只石羊或依偎或张望,温驯可爱。“你看这森严的皇家碑制里,藏着多少人间烟火。”闫霞常会指着这些“石上精灵”给访客看。这些细节在清代官式碑刻中特别罕见,证明即使在等级森严的规制下,细节上也有一些创意,看后令人眼前一亮。

为了寻碑,闫霞曾在三天九钻进门头沟的西峰寺北沟。薄心畲的七处刻石藏在密林深处,寒风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她和两位老师在深沟中穿梭,感觉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等找到“千峰尽成雪”刻石时,手机已被冻得关了机,保温瓶里的热茶冻成了冰碴儿。三个人蹲在沟里,就着雪粒吞咽带着冰碴儿的午餐。当指尖触到“滚雪”二字的刻痕时,闫霞忽然觉得,所有的寒冷和辛苦都值得了——那字里的灵动,分明是百年前艺术家与风雪的对话。

这样的寻碑之旅,在她的日记本里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细节。盛夏的翠微山,她为拍万善桥全景跌进虫群,通红的虫子在脚边蠕动,她拎着相机连滚带爬地上岸,胶卷里留住了石拱与山涧相映的绝景。那座始建于金代的石桥,拱券结构是北京独有的“镶边纵联分段并列式”,桥北石龛的接引佛虽眉眼模糊,刻工的精巧仍清晰可辨。从万善桥往深处走,双泉寺的

清代《重修翠微山双泉寺记碑》,字迹筋骨分明,明代《敕赐香盘禅寺报恩碑》却已斑驳,风蚀的刻痕里藏着数百年光阴。

找翠微山摩崖刻石时,闫霞幸得一位村民引路。所谓的路,其实是野径,酸枣树的尖刺刮破了袖口,手背上添了几道血痕。她沿途撞见两座太监墓,封土上的荒草在风中摇曳。最终在巨岩上见到“翠微山”三个隶书大字,笔力浑厚,下方的题诗透着明代文人的闲情。为拍全刻石,她踩在废弃的水泥管上,脚下晃晃悠悠,比见着虫群还紧张。折返时村民留她吃饭,素面配腌菜就着山风,竟比珍馐还美味。

深秋,丰台区王佐镇西村东侧的高土石坡上,荒草在风中摇曳,蚊虫在草间猛扑。《刘秉权墓碑》孤零零地耸立在野地里,碑座的龟趺正是整座碑刻的魂。寻常龟趺多昂首向前,这一尊却偏过头,似带浅笑回望,鳞爪的纹路藏着灵动。闫霞已在这儿盘桓了三日,镜头始终追着这北京独一份的“回头龟趺”——它打破定式,在萧瑟秋景里,工匠的巧思变成了会呼吸的模样。“每块碑都是有个性的。”闫霞说这话时,眼里闪着孩童般的光。

让石头开口说话 细节中发现韵味

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金石大讲台的公益讲座中,总能听到闫霞清亮的声音。如今她组建了上百人的志愿者讲解团队,“大家看这只老也不高兴的狮子。”她指着《增修三晋庙碑》上的披发石狮,其枣核眼里的愁容,逗得志愿者直笑。2015年,大讲堂刚起步,听者寥寥。闫霞没有被这份冷清困住——她和专家打磨选题,像攒家底儿似的,把听众一点点聚过来。如今这里场场爆满,退休教师带着放大镜来抄碑文,大学生举着手机录讲解,还有祖孙三代一起来的,小孩趴在碑座上临摹石羊的纹样。有一次讲座结束后,一位老人从布包里取出个卷轴,展开时,泛黄的宣纸带着旧时光的温软。“这是我爷爷在拈花寺拓的”,隔着百年光阴,与今时今日的目撞了个正着。

钟鼓楼的乾隆御碑背后,藏着琉璃厂陈家匠人的故事。陈云亭当年站立仰面镌刻,每一锤都需调动全身的精气神。陈氏后人陈光铭看到闫霞的文章来馆里找她,在清茶氤氲中,

对她讲述其祖辈审“石”度势、运腕下刀的细节,让冰冷的石头有了体温。

有一次闫霞接待学生参观游览,一个男孩指着一块石碑上的题名惊喜地大喊:“我找到了太爷爷的名字!”那一刻闫霞忽然觉得,这些石碑不是冰冷的石头,而是积淀厚重历史的文物——那些模糊的名字里,藏着普通人与历史对话的密码。

每年初春,她总惦记着博物馆的文光果树。看它们的花从白转绿,再染成红与紫,像极了古代官服的色彩流转。如今刻石静静躺着,果树却年年开花结果,盛夏时节,她守在树下捡拾文光果,当作课堂上的“秘密教具”。她笑着说:“树比碑更鲜活,每颗果子都是时光的信使。”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义务讲解员团队很有特色,那么多志愿者,为什么会在这件事上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闫霞的回答很简单:“这是一场双向奔赴。”

志愿者们给闫霞带来了许多温暖与感动。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退休教师、企业员工、在校学生,甚至还有外国友人。他们之所以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传播石刻文化,是因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志愿服务的热情,以及对社会的使命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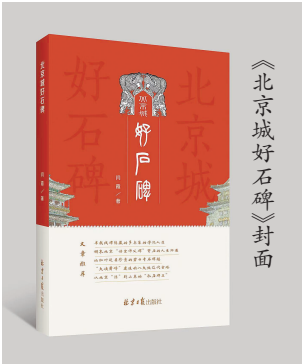
“过去在整理与石刻相关的古籍档案时,我总把这些石刻当作承载文字的实物载体来看待。随着研究的深入,才发现每一块石刻背后都藏着和典籍互证的历史细节,那些凿刻的痕迹里,凝结着古人的典章制度与生活智慧。能把这些从古籍档案中梳理出的文化脉络讲更多的人听,我觉得特别有意义。”闫霞说。

绘制碑刻藏宝图 做好文物说明书

清晨的阳光刚爬上真觉寺的塔尖,闫霞坐在电脑前,点开那个为北京地区碑刻量身打造的数字档案库——屏幕左侧是层层嵌套的文件夹,一万多张石碑照片按年代、地点分类归档,右侧的表格文档里,每通石碑的信息都细致到令人惊叹:从现址到早已变迁的原址,从形制规格、残损程度到纹饰细节、碑文录入,一行行数据像是给石碑刻下了数字身份证,鼠标轻点就能精准定位,仿佛推开了一部会跳转的“石头百科”。

但对闫霞来说,这些基础数据只是起点。真正费功夫的,是把冰冷的档案变成故事。她用十几年的时间,从这些石碑里提炼出明清两代的万历与乾隆专题、盛景绵延的康雍乾路线,以及贯穿元明清的三代脉络等理解北京城的路径,陆续发表了五六十篇文章,把碑刻里的纹饰寓意、碑文背后的朝廷往事、石碑迁徙的岁月轨迹,都化作普通人能看懂的故事。把学术变得通俗化、大众化,让文物“活”起来,是她一直以来的愿望,也是她孜孜以求的方向。就像给每把锁头都配好了钥匙,参观者对哪段历史感兴趣,都能循着她铺就的路径,从石碑的纹路里摸出时光的温度,让那些沉默的石头,能好好讲述藏在岁月里的秘密。

她的办公室里码放着一摞《清史稿》,家里书架上还立着一套同款工具书。书页间的铅字与碑石上的凿痕,常常在字缝里藏着不一样的故事。书页与石碑的碰撞,成了她的新书《北京城好石碑》的灵魂。她翻着书、对着碑,把那些相异的字句反复比对,仿佛在与百年前的史官、刻工隔空对话,让石头里的真性情,慢慢从文字里透出来。



闫霞访谈 北京中轴线申遗期间 整理鲜为人知的石刻

王小柔:为什么同样一块石碑,您总能看到别人忽略的地方,如果不是您特意提醒,我不会注意碑刻上的小羊、蜥蜴、石猴的表情。

闫霞:比如这块石碑上的这些细节,是清代官式碑刻中非常珍贵且罕见的“破格”之作,它们证明了在等级森严、规制严谨的御赐碑刻上,每一处细小的纹饰皆有规制可循,这些小动物绝非随意雕刻,而是暗藏着嘉庆皇帝对平定白莲教起义功臣勒保的恩典。在等级森严的典制框架内,特许加入这些富有生趣的细节,既不失皇家碑刻的庄重,又以微妙的温情,传递着皇帝对臣子的格外体恤。石碑从单纯的纪功述德之物,变成了有温度、有故事的艺术品。这些藏在角落里的“小调皮”,让我们看到,古人也在寻找一种轻松和幽默、一种与严肃历史对话的独特方式。它们证明了历史并非总是板着脸的,那些创造历史的工匠,也有着与今人相通的对美好生活细节的捕捉与热爱。

王小柔:研究石碑的这些年里,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或哪件事让您觉得这项研究特别有意义?

闫霞:在北京中轴线申遗期间,我走遍15个文化遗产点位,专门寻找中轴线上的石刻,并做了详细记录。申遗成功后,我将这些成果整理成文章,内容涵盖中轴线最北端的《御制重建钟鼓楼》、最南端的《燕墩碑》,以及故官文渊阁、景山寿皇殿的碑刻等。此外,我还整理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石刻资料。这些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中轴线上的石刻文化,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也是我作为文博工作者的责任所在。

王小柔:长期从事研究工作,遇到困难时您如何克服?

闫霞:北京地区石刻分布广泛,有些位于偏远区域或不对外开放的地方,深藏难寻,获取相关信息和实地考察的机会很有限。此外,部分石刻因年久失修,保存状况较差,导致信息缺失严重。我多次组织团队进行实地考察,记录石刻的现状,拍摄高清照片,并尽可能获取第一手资料,也通过查阅历史档案,补充实地考察中无法获取的信息。同时,我们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等合作,依托他们的专业积淀与资源支持,为我们的研究补充细节、厘清脉络,让那些模糊的信息更清晰,让碎片化的认知更系统。

(图片由闫霞提供)

讲述

师从王毓宝,传承天津时调艺术

用天津韵天津腔唱天津故事

口述 刘迎 采写 郭晓莹



刘迎

天津市曲艺团天津时调演员刘迎是天津时调创始人王毓宝的亲传弟子,曾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等奖项。她自称“天津时调的搬运工”,除了团里的演出,还在大中小学办讲座,开设培训班,普及天津时调艺术。她说:“这门用天津韵味演唱天津故事的曲艺形式,一定不能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失传。”

老师教我唱天津时调 每一句都要字正腔圆

我父亲学过四胡伴奏,在他的熏陶下,童年的我懵懵懂懂地知道了曲艺这门艺术。1988年,我考入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学鼓曲,后来开始跟随王毓宝老师学天津时调。王毓宝老师在1953年以一段《捧西瓜》创立了天津时调这一曲种,并不断发展,使之成为独具特色的天津本土曲种。她常演的节目有《放风筝》《踢毽》《七月七》《拷红》《翻江倒海》《军民鱼水情》《梦回神州》等。能跟这样开宗立派的艺术学家学艺,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老师家住常德道,她每次来曲

校,都乘9路公交车,在体院北站下车,再步行十几分钟。无论严寒酷暑,老师都会如期而至。她夏天打的那把旱伞、冬天穿的那件羽绒服,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站在学校五楼练功房的窗前,远远看见老师的背影,我就会飞也似的冲下楼,去迎接老师。

在练功房上专业课,我们先是有说有笑地聊一会儿,一旦坐定开始学唱,老师就收起笑容,进入角色,一板一眼、一字一句地认真教唱。我唱得好,老师会立刻表扬;唱得不好,会让我停下来重唱,直到唱准确为止。

王毓宝老师的演唱讲究板眼、节奏、口气、吐字等,尤其是疙瘩腔,抖

得既利索又帅气,那叫一个好听。老师教我演唱时,在这些方面要求得尤其严格,只要唱,就必须拍板,节奏要稳,口气要准,对吐字的要求更高,既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口形不能乱动。她说:“无论唱什么腔,都要保持好字的位置,这就是字正腔圆的道理。”说这些的时候好像很轻松,可真要做起来,那叫一个难!

有一次学拉哈调《耍女婿》,下课后我没好好练功,再上课时,表现得特别不好,一会儿忘词,一会儿唱错调,我心虚冒汗,可越想唱好,就越唱不好,心里真后悔啊,怎么就没好好练功呢?我偷眼一看,老师板着脸,好像生气了。我心想,老师可从没对我发过火,这次肯定会狠狠地数落我一顿。这时,老师站了起来,走到桌子前,给我倒了杯水。望着老师的背影,我真是恨死我自己了,心想:“老师您放心,我知道错了。”老师好像听见了我的心声,转身把水杯递给我:“先喝口水,回去好好练功,下次上课可别这样了。”这温暖的举动、轻柔的话语,远比数落我一顿更有力量,让我感受到动力,当时我真想说一句:“老师,您真好。”

还有一次,老师参加市政协会议,不能来给我上课,提前告诉我,晚

上去她家补课。那时我正学唱二六板鸳鸯调《秦香莲》,言前辙发音口形不对,老师教了我一晚上。我们都忘了时间,直到我基本掌握了发音方法,再一看表,已是晚上10点半了。后来我想,我太不懂事了,老师白天参加了一天会,晚上还要教课,多累啊!但那天我没多想,下课回学校的路上,美滋滋地骑着自行车,嘴里唱着二六板鸳鸯调,只想着那言前辙了,咣当一下,撞在了路边一辆三轮车上,我的车轱辘变成了“S”形。推着车往回走,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嘴里还在哼着二六板。我有一种感觉,感觉自己像是刚刚充满电的电池。

老师就像是我的母亲 我想继承老师的艺术

我只要是去老师家里,基本上都会留下来吃饭。我要说哪个菜好吃,那算行了,老师会不停地给我夹菜,让我吃个够。有一次吃着饭,我说这酱牛肉太香了,结果别人谁也别吃了,老师把酱牛肉打包,让我带回去慢慢吃。我再也不敢轻易说哪个菜好吃了。

冬天上完课,从老师家里出门之前,穿上外套,老师帮我把领子拉严实,就像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真享受那一刻,心里特别温暖,哪还怕什么寒风吹雪。

有一天我在中华曲苑演出,照例化完妆,换上旗袍,走出化妆间,在后台和同事们聊了几句,这时团里一位老师走过来说:“王老师突然病了,住院了,好像病得不轻。”我听完就觉得耳朵里“嗡”了一声,他住下再说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了。那天的演出

是怎么唱下来的,我真的不知道。我与老师在一起的无数个片段,像放幻灯片一样,交替着在眼前闪过。我整个人都麻木了,眼里没有一滴泪,只想赶快长出翅膀,飞到病床前去看望老师。

下台后我找都没聊,怎么打的出租车,怎么到的医院,我全然不知。跌跌撞撞跑到楼上,也没和认识的人打招呼,就听见一句:“别急,在这间病房。”

我径直冲进去,看到老师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竟然还在冲我笑。我再也控制不住眼泪,任由它淌下来。“我没事了……”老师还是笑着对我说,那表情好像是在安慰我,叫你别伤心,“你演出了……唱得怎么样?”老师还在关心我的演出,这最朴实的语言,饱含着她对艺术至真至诚的爱。

提到我个人的演唱风格,记得有一次老师对我说:“你现在可以有自己的演唱风格了。”我没明白老师的意思,正在愣神儿,老师又说:“你现在成长了,也成熟了,可以有自己的演唱风格了。”

我认为,继承老师的艺术是第一位的。王毓宝老师奠定了天津时调的艺术高度,我辈只有在很好地继承的基础上,经过无数次舞台实践,并结合自身的嗓音条件与表演特点,才能去探索自己的演唱风格。后来,我试着为几段新节目设计唱腔,比如天津时调《南湖红船》《西部畅想》《霸王别姬》《美丽家园》等,作出了一些小小的尝试。

以天津话为基础 体现天津人性格

天津时调源自明清小曲,其中有天津本地的,也有从外地流入天津的,被称为“城市民歌”。许多唱段取材于码头、市井,如《踢毽》和《放风筝》。《踢毽》

描绘了三个姑娘轮流踢毽子的欢快场景,用生活化的语言,还原了一段民俗记忆,颇有童趣。《放风筝》具有浓郁的天津乡土气息,唱词融合了民间趣味与方言特色,以姐妹三人放风筝为主线,描绘了“大花篮儿”“小蜻蜓”“锣鼓燕儿”等风筝造型,穿插姐妹间的趣味对话,幽默俏皮。所以,这门曲艺正是天津人格的体现——热情爽朗,又有很强的包容性。

天津时调的演唱,贴合了天津话发音的抑扬顿挫,不过也剔除了天津方言中的齿音字,既保留了方言的特色,其他地区的观众也能听得懂。从曲调上来说,天津时调包含靠山调、鸳鸯调、大数子、怯五更、小五更、拉哈调、悲秋等,可以说是丰富多彩。

除了传统段子,王毓宝老师还创作了很多新作品,下了很大功夫。她说过,设计《军民鱼水情》这段唱腔“张大娘坐在炕头上引线穿针”这一句,用的是慢板鸳鸯调,小琴出时,用的是数板。这样的设计既符合故事内容的要求,又符合人物特点,更能深化故事情节,让观众很快进入故事中。这种创作方式值得我们认真琢磨。

还有一段新作品《津门老字号》:“天津卫海河潮,三岔河口娘娘庙。听我说,听我说,七十二沽百年老字号。津门三绝,狗不理的包子味道好,十八街的麻花,那耳朵眼儿的炸糕。老美华的鞋,盛锡福的帽,正兴德的茶叶,达仁堂的药。国货精品,劝业有招,货真价实信誉高,还得说咱天津卫的老字号。”这段唱词简单易懂,承载了天津的历史和文化。

我觉得,我们这一辈演员有义务把天津时调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可以加入新唱词,去唱当代的故事,唱当代人的情感。把传统曲艺融入当代,就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接受它、爱上它。